

昆仑出版社

昆仑出版社

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

[瑞士]薄复礼 著

张国琦 译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 / (瑞士) 薄复礼著;
张国琦译.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6

ISBN 7-80040-850-7

I. 一… II. ①薄… ②张… III. 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1936) —回忆录 IV. K2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89897号

一个外国传教士眼中的长征

作 者: 薄复礼

译 者: 张国琦

责任编辑: 董保存 吴述波

装帧设计: 王 冬

责任校对: 隼 平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40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唐山天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 A5

字 数: 128千字

印 张: 7.625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1989年8月第1版

2006年9月第2版

印 次: 2006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040-850-7 / I.632

定 价: 17.00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萧克将军谈薄复礼和他的回忆录

薄复礼先生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了。作为当事人、老朋友，我应该讲几句话，介绍一些背景材料。我觉得这对于不熟悉这段历史的中国读者会有益处。

—

我同薄复礼先生相识在1934年10月初。

当时，我是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军团长。我同中央代表，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任弼时、红6军团政治委员王震一起，率部由湘赣根据地西征，经湖南和广西东北部来到贵州的黄平县境内。攻占旧州的前一天，我们在一个小山村内同薄复礼不期而遇。这时，我们正处在紧张的战斗行军阶段，碰上这位不明身份的外国人，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于是就把他和他的夫人等都扣留了。第二天，又把在旧州城内遇上的海曼牧师等人一并扣留。不过，我们很快查明了他们的



身份，并立即把他们的家人释放了。

坦率地讲，这时我们仍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因为我们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又是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这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我们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就这样，薄复礼留了下来。就在这之后的一天，我们有了第一次接触。

那天，我们在旧州教堂内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的晕瀚式贵州地图，但上面所标的地名不是中文。我听拘留他的人说，薄复礼能讲汉语还认识不少汉文，就派人把薄复礼请来。他一看地图就说，这是法文。我请他帮我翻译。于是，他讲我记，整整干了大半夜，把地图上我要知道的法文地名注上了中文。在边聊边改过程中，我不仅知道了许多军事上有用的材料，也知道了他的身世。

当时，我对传教士的印象是不好的。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来中国是搞文化侵略的，所以，把他们当地主一样看待，财产要没收，拘留要赎金。但薄复礼与我合作翻译地图，后来，我们接触的多一些，一起谈过许多问题，一起搞过娱乐活动，一起利用长征途中的难得的休息日子聚餐，相互有了进一步了解，同时，我们对统一战线的认识有进一步的提高，虽然仍没有改变他所处的地位，但对他的印象似乎更好一点。1936年4月12日，我们在释放他的时刻，不仅为他



钱行，还给了他足够的路费。

他在红军中整整生活了十八个月。这十八个月给我们都留下了许多难忘的记忆。他被释放后，据说先到昆明，后又回到英国。在英国居住的日子里，他还是念念不忘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又回到中国，在贵州盘县传教，1952年才离开中国，到老挝的巴色小镇居住。十五年后，他的夫人在巴色去世了，他才告老还乡，现侨居在英国的曼彻斯特。

然而，我们谁也没想到，在五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俩人又重新有了联系。

二

说到我们之间重新取得联系还有一段故事。

那是1984年，美国著名的老作家索尔兹伯里先生来中国采访有关红军长征的素材，准备创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他写信给我，询问一位当年曾为我翻译地图的传教士的情况。他一提及，我就立即想到了薄复礼，想到他与我合作翻译地图的上述情景。

时隔多年，我之所以念念不忘，因为这是一件不能遗忘的军事活动。当年，我们在贵州转战，用的是旧中国课本上的地图，三十二开本，只能看看省会、县城、大市镇的大概位置，山脉河流的大体走向，没有战术上的价值。当我们得到一张大地图，薄复礼帮助译成中文，而且是在最需要帮



助的时候，解决了我们一个大难题，同时，他在边译边聊中，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况，为我们决定部队行动起了一定作用。他帮助我们翻译的地图成为我们转战贵州作战行军的好“向导”。

我作为一个独立行动的军队的指挥者，在困难的时候受到人们的帮助，不管时间多久，也难忘记。想到这些，我马上给索尔兹伯里先生回信，向他介绍了全部的过程，尔后，我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如能见到这位友人（假如他还活着）或其家属，请代致问候！”

索尔兹伯里办事很认真，回国后不久就给我寄来了薄复礼写的那本书。后来他又跟随追寻到英国，在曼彻斯特找到了薄复礼本人。他们交谈甚久，气氛融洽。索尔兹伯里转达了我的问候。

事后，索尔兹伯里给我寄来了他们交谈时的合影，介绍了他们的交谈情况，而且还带来了薄复礼的问候。

从另一个途径找到薄复礼的是我国的外交人员。

1984年秋，我出国访问，途径法国。我就委托有关方面打听这位牧师。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在1985年初通过薄复礼在瑞士的亲友比吉特夫人的关系找到了薄复礼。薄给我中国驻法使馆工作人员回了信，在信中介绍了他本人的近况，还委托他们向我“转达热忱的问候”。

此后，英国白城电影公司的辛格和格雷先生来中国访问，薄复礼又委托他俩带给我一盘有关他近况的录相带和他



出版的两本书。现在所译的就是其中的一本。

1986年5月，我通过外交部门，向薄复礼去信，表示问候。前不久，我托人转送给他一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六十周年的画册。我转告他，五十年前，他接触过的中国工农红军如今已大变样了，虽然他已经不可能来中国看看，但从这本画册中也可知其概貌。

就这样我们在五十年之后，又重新取得了联系。

我要感谢索尔兹伯里先生，他为我们重新取得联系做了许多工作。我还要感谢其他许多热心人士，他们或提供线索，或帮助寻找，对于他们这种肯于助人的精神我深感敬佩。

三

也许有人会问，一个是外国牧师，一个是共产党人，有必要联系么？

或者说，这件事本身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有意义，联系也有必要。

中国革命胜利了。在中国革命通向胜利的征途中，有不少国际友人作过贡献，他们无疑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同时，也还有一些外国人士直接或间接地做了有利于我们的事情，我们对他们同样不应该忘记。比如薄复礼先生及其一类的传教士，他们到中国来宣传教义的同时还办学校，



翻译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开展慈善事业等等，客观上起过好作用。当然，薄复礼先生不是主动来为红军服务的，但他为我提供了地图的译名，翻译了一些英文资料，购买了一些药品，等等。这无疑有利于我们，这样，就成了我长期记着他的原因。细心的读者也许还记得，早在1980年，我在《近代史研究》第1期所发表的一篇回忆录中，就提到了薄复礼的这段事。回忆文章是这样写的：

“我们打到黄平，在法国教堂里，找到一张近一平方米大的法文贵州地图，但看不懂。好在那里有个法国牧师能讲点中国话，不能写，发音也不准，但还能够听得懂，我们就指着地图，他讲我写，迅速译成中文，有了这张地图，才稍微详细地看清贵州的山川城乡的大路，行动才开始方便了一些。”

从这一段文字可以看出一种悠然快意的怀念之情。阶级社会中阶级是对立的，但作为具体的个人来对待时，人的信仰可以不同，但并不影响相互间的交往。甚至互相影响，发展友谊，成为朋友。这种例子并非少见。历史还证明，人的社会意识有很大差异，对事物的看法不同，但总有一些共同点，有共同关心的话题，十九世纪后期南丁格尔的人道主义，红十字会的迅速推广，就是作为人类救死扶伤的社会意识的共同点。孟夫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指的就是人类共同的社会意识。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绝大多数人都要求和平共处，也是如此。过去我们曾存在“左”的



观点，非革即反，非反即革，根本否定各国各阶级各种社会集团的共同点，不懂得寻找共同点，用共同语言交换意见，求得一致，不知吃了多少亏。现在人类普遍关心的是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需要更多的国际朋友，来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并进而帮助中国，中国应该充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薄复礼先生是被我们关押过的，但他不念旧恶，这种胸怀和态度值得敬佩，这种人也值得交往。

四

现在，再谈谈他的书。

据他本人讲，关于记述他在中国的事，他先后写过两本书。一本于1936年出版，一本于1974年写成。两本书的基本内容一样，只不过后一本增加了他从来中国到离开中国的全过程。

作为传教士，他所写的当然是宣传上帝，上帝指引他前进。他之所以大难不死，就是因为上帝救了他。

显然，在这些观点上我们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者。

那么，我们欣赏书中的什么内容呢？

有人说，他作为外国人第一个向国外客观报道了中国红军的长征。还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考证，说他记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这本书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要早一年时间。

这是一个方面，但不是主要的。

也有人说是他在书中反驳了官方报纸和某些新闻界称红军为“土匪”或“强盗”的说法。在那时，蒋介石处处称红军为“匪”，亲蒋的西方人士也称红军为“匪”，几乎没有例外，而薄复礼先生则认为“这些人实际上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实践着其原理，是另一种形式的苏维埃。”他认为红军不是“土匪”和“强盗”。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仍不是主要的。

其主要方面我认为是他记录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一个侧面。历史是多方面的，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自然也不例外，也是一个多侧面的。有一个时期，我们的研究者，往往喜欢看它的正面，不想看它的侧面，更不敢看它的背面，特别是在那动乱的年代，许多书都属在禁之列，更不用说出版这类的书了，我觉得这是不好的。薄复礼从传教士的角度来观察红军、理解红军，记下了他的所见所闻以及他的感想，的确是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对于我们研究红军有很好地参考价值。

当然，研究历史问题，还得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薄复礼先生在书中所讲的有些是不准确的。比如说红军为什么能放他，他说是因为上帝在救他。其实这是我们的思想政策水平在逐渐提高的缘故。过去，我们做过一些蠢事，在一贯优待俘虏



政策之下却排除高级军官，象张辉瓒这样的知名人物就被杀了。随着世界和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步步进逼，我们的认识起了变化，后来这一类人我们就不杀了。薄复礼书中写到的国民党第41师的中将师长张振汉我们就没有杀，不仅没有杀，还让他做了我们湘鄂川黔边红军学校高级班的战术教员。书中还提到一个老先生是周素园，曾是北洋政府时期的高级官员，同我们一起在贵州西北部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并一起长征到陕北。之所以发生了这个变化，是因为这时期，我们在共产国际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号召及中央抗日反蒋的总方针指导下，从思想上认识要团结更多一些人，要搞统一战线，尤其是中央发出“八一宣言”后，我们就执行得更自觉了。因此，对薄复礼的态度，我们也在逐渐改变，到昆明附近，就无条件让他回去了。

由此看来，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必须注意当时的历史背景，持分析态度。

五

借这个机会，顺便谈几句研究历史的态度问题。

记得在七十年代初，我有幸去了井冈山，正遇上两个县的同志在争论一个问题，即毛泽东在何时、何地任命林彪当团长。甲说在甲县，乙说在乙县。双方争论不休，虽然没



有说明争论的目的，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大概不外是争点“光”吧。

同是这个林彪，在摔死前，有些人说他是南昌起义的正确代表，说他是湘南起义部队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的代表人。而摔死后，则连他在南昌起义时的连长职务也“贬值”了，改成了见习排长。

这很不好。历史就是历史，不能片面地去“为政治服务”而加以歪曲。真理只有一个，是不能以“政治上需要”来改变的，现在虽然没有那样说了，但有些同志，喜欢锦上添花，或落井下石，甚至制造材料，否定事实。当然，这里是指那些“始作俑者”，至于有些人云亦云、任意传抄者，虽非有意，但也不好，都不是唯物主义态度。

还有一种人，对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喜欢引用权威的话来论证历史。以大人物之势来压人，把一些比较清楚的历史问题搞复杂化了。我曾经说过，什么是权威？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我们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不唯定论。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而不能因人而异。

要搞清历史事实首先应该广泛地搜集前人记述的历史资料，讲好话的要收集，讲我们坏话的也要参考。有些人总喜欢听好话，歌功颂德，不亦乐乎？但是，一听到说我们有那处不好的就不自在。其实，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好话不一定就好，坏话不一定都坏，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好话和坏话。我们哪能事事都做得好呢？有了错误，自己不愿讲，也



不让人家讲，这是不正确的。讲坏话的人当然也有立场问题或者说角度问题，但我们不仅要注意讲话人的立场而且更要看他的讲话是否言之有据。薄复礼的这本书他不可能讲我们更多的好话，但只要他讲的东西是真实的，有史料价值，揭了我们的短处又有什么关系呢？逝者不可追，但来者可鉴。

总之，在研究历史过程中，第一步就是要搞清楚史实，对于前人记述的历史资料，要广泛搜集。在搞清楚史实的基础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地理解事实，鉴别事实的价值，寻绎其相互间的关系，从分析到综合，从中寻出历史进步的规律。

一句话，“求实存真”。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一个原则。同时，我想，这也可以作为出版这类书的一个理由罢。



作者中文版自序

为拙作中文版作序这当然是一件颇为荣耀的事情；在晚年被称之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更使我激动不已。

此刻，当我在英国曼彻斯特我的书桌前写下这几句话的时候，我又见到了萧克将军。这是一张放大的彩照，将军正在一本装帧漂亮、图文并茂的画册上签字。萧克将军把这本画册作为礼物送给了我。

这本画册勾起了我对往事地回忆。

五十年前，我被中国红军扣留十八个月，这支红军就是萧克将军的第六军团。我第一次见到萧克将军是在一次急行军之后的晚上。当时我被不期而遇的红军扣留了好几天，每天行军，疲惫不堪。这天晚上，刚要歇息，将军召见我，要我帮他翻译一张法文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是他们刚缴获的。我端详着面前的萧克将军：他约有二十五、六岁，一副极标准的军人仪表，谈起话来温文尔雅，让人感到他有很好的文化修养，有渊博的知识，是一位可敬的年轻领导人。虽然我们之间历史背景不同，文化教养各异，一时间，彼此也



无法理解，但我非常敬佩他。当时我想，凭他的文化教养就可知道，将军的家境是不错的，生活是安逸和舒适的，可是他为什么要抛弃这一切而去为被压迫的农民、为80%的穷人勇敢奋斗呢？毫无疑问，他这样做，不仅本人风险极大，而且要累及家人及亲朋友好。后来我知道，将军在青少年时代，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并接受了他们的思想观念，他确认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所以他为之奋斗，坚定不移。

同他一样，我在少年时代也有被征服的经历，但征服我的是耶稣基督的革命教义。在我懂得了耶稣的历史和教义之后，我决心要为人类的进步而贡献毕生的精力直至生命。十岁时，我听到上帝召唤我去中国，就开始接受各种训练，以便在中国能更好地工作。1922年，我告别家乡，告别亲人，来到中国，到中国最穷的省份之一贵州工作。在贵州工作是很艰难的。这里没有可供车辆通过的大路，长途旅行都要靠双脚完成；这里极少见到欧洲同乡，他们一般不往这里来；这里强盗、土匪出没，抢劫时有发生，社会环境极不安定。等等。尽管有这些不利因素，我却依然快乐如初。为什么呢？因为我确信，我所到的地方是上帝安排的，我所做的事情都是上帝的旨意。我的动机是纯洁的，上帝给我一个特殊的爱，爱中国人民。

后来，我成为红军的囚犯。十八个月的艰难困苦是我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上帝在陪伴我，安慰我，在危难时刻



和考验面前，唯有上帝与我同在，没有他，我不可能活着走完这段旅程。

记得我在昆明医院，一位医生给我检查完身体之后说我至多还能活十天。经过五个月的精心护理之后，医生还是告诫我，不要期望长寿。但是，今天我已九十一岁了，我相信我的身体仍然很结实，我过得很快活，还能做些事情。是上帝给了我一颗宁静的心，他能治愈病人并加强人的力量，使人洞察一切。

亲爱的中国读者，这是我一生中的简历，我把这些推荐给你，我相信你可以从中得到益处，帮助你成为你们伟大国家的一个更好的、更有用的公民。我看到有关你们国家的许多报道，我为你们的每一个进步而高兴。你们的国家在经受许多磨难之后，终于使人民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对那些政府要人，对学校学生及家人，我每天都为他们祈祷。我相信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忘记自己的私下的高兴而从帮助和热爱其他人中得到自己的满足。

薄复礼

1988年6月15日